

# 戰後吳濁流文學在日出版與傳播的文化政治\*

## —— 以〈無花果〉為例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摘要

吳濁流（1900-1976）是少數戰後在日出版多部作品集的台灣作家，本論文將探討戰後吳濁流文學在日出版與傳播的情況，釐清作為吳濁流的後殖民文本〈無花果〉，在前帝國日本出版與傳播的文化政治。筆者首先耙梳吳濁流在五〇年代如何在戰前南京《大陸新報》時期同事等人的協助下，出版了《アジヤの孤兒》和《歪められた島》，建立他在日本的人際網絡。接著，釐清在七〇年代吳濁流如何利用出訪日本的機會，在戴國輝等人的協助下，〈無花果〉如何連載在日本的《中國》，解決《無花果》中譯本在台灣島內遭禁的問題，並說明手抄稿、中文版與日文版之間的版本問題。最後，探討收入《夜明け前の台湾》的〈無花果〉，引起不同立場的評論者和讀者怎樣的迴響，試圖藉由吳濁流文學這個案研究說明，冷戰時期台灣文學「流亡」日本的傳播軌跡，及其呈現的文化現象。

關鍵詞：吳濁流、〈無花果〉、戴國輝、文化政治

---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戒嚴時期吳濁流文學在海外的出版與傳播、接受」(113-2410-H-007-070)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誌謝。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ostwar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u Zhuoliu's Literature in Japan:

## A Case Study of "The Fig Tree"

---

**Wang Hui-Che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Wu Zhuoliu (1900–1976) was one of the few Taiwanese writers whose works were published and disseminated in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twar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u Zhuoliu's literature in Japan,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involved in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Fig Tree," a postcolonial text by Wu, within Japan, the former colonial power.

Firstly, this study traces how Wu,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from the prewar period at *Dalu Xinbao* in Nanjing, successfully published *Orphan of Asia* (*Ajiya no koji*) and *Distorted Island* (*\*ugamerareta shima*) in the 1950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personal network in Japan. Next, it examines how, in the 1970s, Wu leveraged his visits to Japan and, with the help of figures such as Tai Kuo-hui, managed to serialize "The Fig Tree" in the Japanese journal *Chūgoku* (China), thereby circumventing the ban impose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iwan. This section also clarifies the textual variations among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he Japanese edition.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eption of "The Fig Tree," as included in *Taiwan Before Dawn* (*Yoake mae no Taiwan*), by critics and readers from divers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By examining this case study of Wu Zhuoliu's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seeks to delineate the dissemination pathways and trajectory of Taiwanese literary 'exile' to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e cultural phenomena it generated.

**Keywords:** Wu Zhuoliu, The Fig Tree, Tai Kuo-hui, Cultural Politics

## 一、前言

吳濁流（1900-1976）是台灣古典文學的二世文人，同時也是日語新文學作家，擅長以「漢詩」記錄生活，以「小說」紀實社會。創作時間橫跨戰前戰後，除了參加古典漢詩社栗社（苗栗）、大新吟社（新竹）的活動之外，也積極以日語寫作。創作文類含括漢詩、隨筆、小說等，以漢詩作品量最大，被尊稱為「鐵血詩人」（鍾肇政語）。六〇年代吳濁流在島內利用個人人脈獨資於1964年4月創辦《台灣文藝》，積極地向各界募款。在外省人主導的台灣文壇，為省籍作家新闢重要的發表園地，成為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靈魂人物。

戰前吳濁流未曾留日，但曾短暫前往中國南京任職，戰後卻曾訪日五次。晚年他多以商業考察為由，環遊各地。他的日本行程，除了遊山玩水參觀名勝古蹟之外，也會順道尋友飲酒賦詩，雖然舟車勞頓但他卻樂此不疲，並留下諸多紀行散文和漢詩。訪日聚會他則善用漢文化圈中的「書道」技藝，即便自謙字拙，總是以詩會友揮毫贈字。他在日本文友的協助下，成為戒嚴時期僅次於旅日作家邱永漢（1924-2012），是在日本出版最多個人作品集的台灣作家。

除了漢詩文之外，吳濁流在台刊行的中文長篇小說集幾乎都是「翻譯」而成的譯作，其中《亞細亞的孤兒》和《無花果》皆有中、日文版，又加上「手稿版」，竟而出現「一作多版本」的問題。《亞細亞的孤兒》的版本研究，已積累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例如河原功釐清了《胡志明》與《アジアの孤兒》的版本差異。<sup>1</sup> 豐田周子版本進一步將版本差異之處表格化，並根據日本讀者的回饋內容，說明這本小說集的出版，促使戰後日人反省戰前殖民統治的罪責，自省應該如何面對殖民問題的契機，肯定作者重新編排，強化小說的寓意性，是成功的。<sup>2</sup> 但，由於這兩位研究者皆未掌握吳濁流的漢詩內容，未關注到吳濁流任職南京《大陸新報》時的同事關係。五〇年代吳濁流的《アジアの孤兒》和《歪められた島》在日出版過程中，他們其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相較於《アジアの孤兒》的版本問題，七〇年代在日刊行的〈無花果〉的版本問題，卻鮮少受到關注，因此本文

1 河原功，〈吳濁流《胡志明》研究〉，《台灣文學研究》10期（2007.06），頁77-110。

2 豐田周子，〈『胡志明』から『アジアの孤兒』へ—その改編をめぐる—〉，《東洋文化研究》12號（2010.03），頁33-65。

將以〈無花果〉<sup>3</sup>作為主要探討文本，釐清戰後吳濁流文學在日出版及其傳播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本文首先將梳理吳濁流如何利用書信往返和訪日的機會，重新建立他戰後在日的人際網絡，並釐清吳濁流文學七〇年代在日出版的社會背景及其脈絡。接著，探討吳濁流文學在戴國輝等人的協助下，〈無花果〉如何渡海在日本的《中国》連載和在日出版發行，解決《無花果》中譯本在台灣島內遭查禁的問題，並說明手抄稿、中文版與日文版之間的版本差異。最後，探討〈無花果〉在日刊出後，引起不同立場的讀者怎樣的迴響？藉此釐清作為吳濁流的後殖民文本〈無花果〉，在前帝國日本出版與傳播的文化政治。

## 二、五〇年代吳濁流作品集在日出版

戰前台灣日語作家多以殖民地作家的身分，參加徵文比賽，藉由獲獎進入日本文壇，例如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等人，但他們並未在日出版過小說集。五〇年代在日本出版與台灣相關的作品集，除了從台灣「引揚」（被遣返）的日人作家西川滿的小說集《台灣脫出》（日本東京：新小說社，1952.01）、坂口禰子的《蕃地》（日本東京：新潮社，1954）等之外，邱永漢和吳濁流是少數在日出版日語作品的台灣作家。五〇年代邱永漢從香港流亡到日本，1955年以〈香港〉一作榮獲直木賞，前後出版了《濁水溪》（1954年）、《密入国者の手記》（1956年）等多部以台灣為題材的日語作品集，並在日本文學界建立人脈關係，成為當時在日的台灣作家代表。

「在日」的邱永漢具有「東大畢業生」、「直木賞獲獎者」等相關資歷，後來成為「賺錢之神」，在日本撰寫理財、美食的文章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反之「在台」的吳濁流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在日本文壇名不見經傳，但日本出版社為何願意冒然出版他的作品集？換言之，在五〇年代他究竟是透過怎樣的關

---

3 〈無花果〉1968年5月起，於《台灣文藝》（5卷19-21期，季刊1968年5月、7月、10月）連載。1969年4月起，於日本的《中国》（65-69號，月刊1969年4-8月）連載。1970年10月《無花果》由林白出版社出版遭查禁。1972年6月由東京社會思想社出版吳濁流的《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收錄〈無花果〉一作。本文將以篇名號和書名號區別「無花果」的刊出形式。

係，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吳濁流文學之所以得以在日順利出版，與他的旅外經驗有密切的關係，除了戰前的中國經歷之外，戰後的訪日活動更是重要的關鍵。除了戰前 1919 年因修業旅行前往日本旅遊 18 天之外，戰後曾五次訪日，並寫下許多紀行文和漢詩發表於《台灣文藝》等，<sup>4</sup>如下表：

	年齡	期程	訪日之旅相關作品
一	58歲	1957年春天，為期6星期。	〈東遊吟草〉102首。《風雨窗前》 <sup>5</sup> （苗栗：文獻書局，1958.05），頁34-53。
二	66歲	1965年秋天，中途經香港、日本為期45天。	〈再東遊吟草〉120首、〈東遊雜感〉《台灣文藝》13、14期（1966.10、1967.01）。 *日文原稿刊於《今日之中國》4卷5、9、12號（1966.05、09、12），頁10-14、40-43、42-45。 <sup>6</sup>
三	69歲	1968年環球旅行，排入日本行程。（10月25日-11月13日）	〈談西說東〉，《台灣文藝》22、23期（1969.1、04），頁68-89、41-70。 收錄於《談西說東》（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69.04）。
四	72歲	1971年先至琉球再遊日本（4月8日-5月22日），為期45天	鍾肇政譯，〈東遊雅趣〉，《台灣文藝》33、34、36期（1971.07、1972.01、1972.07），頁89-90、頁79-83、頁79-85。
五	75歲	1974年遊南美後（4月7日~5月11日），再轉往日本旅遊2星期（5月11-24日）	〈睽違三年 重遊日本〉，《台灣文藝》47期（1975.04），頁64-69。

4 涂瑞儀，〈吳濁流的漢詩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42-50。作者歸納吳濁流戰後的旅日漢詩有二：1. 詩主抒情與寫景詩。2. 批判日本殖民者的狡猾，但卻也肯定戰後重建迅速，優點值得借鑑，缺點值得警惕。

5 《風雨窗前》雖是漢詩文集，後附小說〈陳大人〉、〈先生媽〉兩篇，作品之前有簡短的作者言，文字的表现深具有跨語跨時代的特點，例如「歪められた島」直譯「被歪了之島」應是「被扭曲的島嶼」，「發不起衝力」應是「提不起勁」等。

6 根據筆者初步的核對，如正文表格《台灣文藝》與《今日之中國》中、日文版本譯文有一些差別，日文作品的副標為「漢詩日本觀光記」，作者括號加註：（詩人）。

戒嚴時期吳濁流主要是以「永和順股份有限公司」<sup>7</sup>董事長的名義申請商業考察出訪，旅費主要由這家公司股份分紅所得支付。<sup>8</sup>他的訪日行程多以旅遊觀光為主，訪友敘舊則是他另一個重要的行程。

戰後初期是吳濁流日語作品集出版的高峰期，包括日語長篇小說《胡志明》（第一篇～第三篇，台北：國華書局，1946.09-11；第四篇，台北：民報總社，1946.12；第五篇，台北：學友書局，1948.01）、小說集《ポツタム科長》（台北：學友書局，1948.01）和評論集《夜明け前の台湾》（台北：學友書局，1947.06）。1946年10月25日起台灣島內定期刊物和報紙的「日語版」雖遭禁刊，但吳濁流的單行本仍持續發行。

五〇年代吳濁流試圖在日出版《胡志明》，據說工藤好美（1895-1992）教授除了曾協助潤稿之外，也曾積極媒合吳濁流的《胡志明》在日本的雄雞通信社出版，但最後因出版經費問題胎死腹中。<sup>9</sup>最後，只見吳濁流的〈台湾文学の現況〉<sup>10</sup>刊於雜誌《雄雞通信》之上。這篇作品主要是批判戰前在殖民統治下台灣沒有真正的文學，另外也提及二二八事件對文學界的影響：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當時不只是日文書籍，人心更是惴惴不安無法顧及文學。到了今年，事過境遷，人們對事件的記憶逐漸淡化後，文學才又受到重視，成為討論的主題。在《台灣新生報》上論辯「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甲乙雙方輪番討論，莫衷一是。但有心人也知道臺灣過去有很長的期間被特殊處置，更加誇大台灣的特殊性，這種論調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最終繼續保持沈默。臺灣文學大致情形就是這樣。因此，老作家依然守著沉默主義，新人作家左顧右盼，未有定見，在文學之前徘徊不已。

7 永和順股份有限公司於1966年由永和企業行（1957年設立）改組而成，並受日本精工株式會社指定為台灣總代理，經銷NSK軸承產品，設址於台北市寧夏路17號之2。（來源：<https://www.yhsco.com.tw/%E9%97%9C%E6%96%BC%E6%B0%B8%E5%92%8C%E9%A0%86>。檢索日期：2025.03.13）。

8 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04），頁164-165。

9 吳濁流，〈中文版自序〉，《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07），頁1。

10 吳濁流，〈台湾文学の現況〉，《雄雞通信》通卷39號（1949.01），頁14。

此時，吳濁流利用日本媒體具體報導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文學發展的影響。除了工藤好美之外，戰後初期曾在台留用的台北帝大教授早坂一郎（1891-1977）和當時已具知名度的女作家坂口禰子（1914-2007）也曾為這本小說的出版使力，但卻未能如願似償。直到吳濁流聯繫上戰前南京《大陸新報》的同事上野重雄，並在他的奔走協力下，這本小說才得以順利出版。<sup>11</sup>

### （一）南京《大陸新報》同仁的相助

戰前吳濁流自1941年1月至1942年3月在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學部同學鍾壬壽（1902-1979）的協助下，前往中國南京從事翻譯工作。但他因對當時的職場有諸多不適，1941年2月轉往南京《大陸新報》擔任記者，這段中國經歷成為他日後反覆書寫的重要題材。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3月他攜家帶眷返台，隨之將這段經歷寫成〈南京雜記〉，連載於《台灣藝術》（通卷32-34號，1942.10-1943.1），而這些內容與他在南京擔任《大陸新報》記者的報導書寫有其密切的關聯性。<sup>12</sup> 他的自傳性小說《胡志明》、《台灣連翹》等中也一再地提及這個時期的中國經驗。

除此之外，當時吳濁流也以漢詩記錄他與報社日人同事出遊的情景，<sup>13</sup> 漢詩〈初秋與上野編輯部長共登豁蒙樓〉（頁155）、〈秋日與西島社長泛舟於玄武湖〉（頁158-159）等，<sup>14</sup> 「上野編輯部長」即是吳濁流在南京時力邀他到《大陸新報》任職的上野重雄。<sup>15</sup> 戰後五〇年代正因上野重雄居中斡旋，將《胡志明》轉介紹

11 同註9，頁1。

12 白筱薇，「第三章 返台後大陸生活之相關作品：《南京雜感》與《胡志明》（1942-1945）」，〈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37-74。

13 除了漢詩之外，吳濁流也留下他們野餐的合影照片。張恆豪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2 吳濁流》（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21。

14 吳濁流，《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台北：廣鴻文出版社，1967.04）。

15 吳濁流寫了多首漢詩給上野重雄，例如：在《風雨窗前》「淡北雜吟」中〈寄上野兄〉、〈重寄上野兄〉提到：「出版無消息，此心那得酬」、〈春日懷上野兄〉、〈歲暮憶上野兄〉（1955年12月30日作）、〈謝上野兄寄藥〉，可見五〇年代他與上野重雄書信往返頻繁。見吳濁流，《風雨窗前》（苗栗：文獻書局，1958.05），頁96-100。

另一位南京《大陸新報》的同事中澤富美雄的出版社，幾經刪削<sup>16</sup>才順利發行了《アジアの孤兒》（日本東京：一二三書房，1956.04）。

1957年吳濁流戰後第一次訪日立即拜會這群南京《大陸時報》的舊同事，「引杯豪興東來客／情似金陵酒肆中」（〈於舊同事歡迎會席上作〉<sup>17</sup>）；1965年吳濁流又再訪西島五一社長和南京時期的舊友，<sup>18</sup>並以漢詩記錄此趟行旅的雜感。西島特地在他主編的《經濟論壇》上刊出這篇雜感的第一部分至「訪金關天彭」為止。<sup>19</sup>這一次重逢的友人當中除了西島之外，還有上野重雄、神田孝一、高橋誠一等人也特地前來相聚，「聯床一夜話金陵／偏為情多憶故人／蝸角爭雄原是夢／臺城楊柳自迎春」。<sup>20</sup>然而文中卻題詩〈弔中澤富美雄〉「回憶金陵共事時／他山攻錯喜相知／忽然化鶴歸天去／遺下妻兒痛泣飢（其二）」（同上），悼念年僅47歲早逝的中澤。總而言之，吳濁流在日出版的第一本小說《アジアの孤兒》（1956）的過程中，多虧南京《大陸新報》社舊同事的鼎力相助，才得以在日本順利出版。

因中澤早逝，隔年書名改成《歪められた島》（被扭曲的島嶼，1957，日本東京：ひろば書房），轉由另一位南京《大陸新報》同事神田孝一發行，但仍沿用一二三書房的版型再版。小說的發行宣傳較為積極，特地邀請中國研究者村上知行（1899-1976）、戰前在台日人學者中村哲（1912-2003）撰寫序文，矢野峰人（1893-1988，當時為東京都立大學校長）撰寫書腰介紹。另外，在日本引揚

16 吳濁流，〈《亞細亞孤兒》自序〉（1962.03序），《吳濁流作品集卷6 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185。「這篇小說在日本出版時，為節省紙張的關係，刪削很多。」根據河原功的統計，《亞細亞的孤兒》與《胡志明》相差的50%以上，因內容刪減的關係，弱化了原來《胡志明》中作者所展現的批判性。（河原功，〈吳濁流《胡志明》研究〉，《台灣文學研究》10期，頁77-110）。

17 吳濁流，〈東遊吟草〉，《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163。

18 吳濁流，〈東遊雜感〉，《經濟論壇》113號（1966.04），頁27-33，寫了〈在伊東絕食道場受西島五一夫妻及上野重雄、神田孝一、高橋誠一等歡宴有感〉一詩。

19 吳濁流，〈東遊雜感〉（同註18）在正文前編者特地說明，本文只刊載一部分，但從中「除了他的詩才和知性之外，更讓我們切身體會到台灣人民的情感」。同時，在每個小段落前加上小標。日文全文則刊於《今日之中國》4卷5、9、12號（1966.05、09、12），頁10-14、40-43、42-45。這一次的重逢友人除了西島之外，還有上野重雄、高橋誠一等人。其中，中澤富美雄即是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日本東京：一二三書房，1956.04）的發行者。

20 吳濁流，〈東遊雜感〉，《台灣文藝》3卷17期（1966.10），頁47。

者（被遣返者）刊物《愛光新聞》亦可見廣告文〈小說「ゆがめられた島」吳氏の力作〉，<sup>21</sup> 簡介如下：

以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為背景的小說〈被扭曲的島嶼〉，由台灣人以日文寫成由日本出版社出版。作者吳濁流氏曾是教員，後來擔任記者，日本敗戰時轉任新生報，是位教養和感性都很豐富的人。描寫主人公太明在台灣「黎明前」的大動亂中被蹂躪，即使到日本留學和前往中國皆無法找到安頓，被社會的激流推著走，最後發瘋的生命經歷。有愛戀、有笑有淚的力作。對於同時代在台灣的日本官員、報社記者和民眾來說，這是一本令人感到尷尬的讀物。

顯然，作者將這本小說集定位為控訴日本殖民統治的作品。尾崎秀樹也憶及他曾在舊書攤的書堆中挖出一本十圓的《被扭曲的島嶼》。當時購入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作者「吳濁流」，而是因為書籍內容與「台灣」有關。尾崎認為這本書是「青春的遺書、歷史的證言」。<sup>22</sup> 吳濁流訪日時兩人也曾見過多次面，1965年訪日時留下漢詩〈與杉森久英、中村教授、立石畫伯、尾崎等敘舊〉一作、<sup>23</sup> 1971年訪日時留存紀念合照等紀錄。

由於〈無花果〉中吳濁流已詳述了他與工藤好美跨時代跨國籍，亦師亦友的情誼，戰後訪日亦多次拜訪他。<sup>24</sup> 除此之外，吳濁流戰後在日本，訪舊與結識新知的過程中，究竟建立怎樣的交友情誼，對他的文學活動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

21 作者不詳，〈小說「ゆがめられた島」吳氏の力作〉，《愛光新聞》34號，1957.07.01，2版。雖然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草根版）的〈中文版自序〉中提到，這一版小說出版後，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注目。但是，豐田周子的〈『胡志明』から『アジアの孤兒』—その改編をめぐる〉，《東洋文化研究》12號，注40提及並未找到相關書評，筆者只確認出這一筆。

22 尾崎秀樹，〈吳濁流の文学〉，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日本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06），頁303。這一篇成為葉石濤戰後的第一篇譯文，發表於《台灣文藝》10卷41號（1973.10），頁77-84。

23 吳濁流，〈再東遊吟草〉120首，《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198-199。

24 王惠珍，〈龍瑛宗與新竹地區藝文人士的社群網絡研究〉，《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9期（2023.02），頁49-78。

以下試就說明戰後他與金關丈夫（1897-1983）、坂口禰子（1914-2007）、戴國輝（1931-2001）的互動情況。

## （二）與金關丈夫重逢

1957年吳濁流戰後第一次訪日除了拜會當時任職奈良女子大學的工藤好美（1898-1992）和東京的立石鐵臣（1905-1980）等戰前在台日人之外，也前往九州福岡拜會金關丈夫，「福岡春色百花紅，偶得今宵感慨同」。<sup>25</sup>金關教授伉儷也於1960年受邀戰後首次訪台，並在台泥大樓前合影留念，吳濁流亦現身其中。<sup>26</sup>1965年吳濁流第二次訪日因「心餘力絀空嗟嘆，悵望奈良一角天」<sup>27</sup>兩人未能碰面。1968年吳濁流環遊世界再訪日本時，兩人又在奈良天理重逢。因金關夫婦的熱情體貼，讓借宿的吳濁流感到賓至如歸，多次叨擾。在戴國輝收藏的〈無花果〉日語原稿中的刪除之處隱約可見：

四、五年前，金關教授對我說□□，既然沒有人在日本傳達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建議我應該把它寫下來。當時我卻反問他為什麼在最自由的日本，可以客觀地寫卻不寫。教授卻對我說，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日本寫作團隊已經退場。日本人寫的作品裡頭，有很多與事實不符。而且他也讀過在大陸出版的作品，事實上也遭到政治性的扭曲，並未寫出真實的情況。由於事發當時這位教授被留用，仍待在台灣，我想此言不差。由於這個問題太難了，我尚未提筆。至今已過了五年。再過五年，我將更無法下筆，對此感到很困擾。（筆者自譯）

「四、五年前見到金關教授時」的對話，又〈無花果〉第一章原稿脫稿時間是1966年6月。<sup>28</sup>根據時間推估，金關教授鼓勵他撰寫二二八事件，應是於

25 吳濁流，〈訪金關，福田兩教授〉，《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168-169。

26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 日本語版》第一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頁xxix。

27 吳濁流，〈不訪奈良寄金關丈夫〉，《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193。

28 筆者根據藏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https://hslib.sinica.edu.tw>）「特藏影像系統」的「戴國輝版」

1960年金關來台前後的事。至於小說的題目，根據張良澤收藏的「日語手稿」，原標題應是〈私は見た二二八事件〉（中譯：我所見到的二二八事件），<sup>29</sup>顯然吳濁流一開始只是單純地想寫「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吳濁流或許深懼連累金關教授，最後刪除這一段寫作動機的說明。畢竟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書寫仍充滿政治禁忌，為迴避官方審查他最後只好改用在《亞細亞孤兒》中出現的植物名「無花果」：

某日，大明正佇立在庭前遐想，突然發現無花果已經結了果實，那些疎疎落落的豐碩的果實，隱蔽在大葉的背後，不留神便不容易發現。他摘了一個剖開來看看，那熟得通紅的果實，果肉已長得非常豐滿。他一面凝視着果實，一面心裏發生無限的感慨。他認為一切生物都有兩種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雖然美麗，但花謝以後却不結果；又如無花果雖無悅目的花朵，却能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結起果實。<sup>30</sup>

吳濁流也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結出《無花果》這本小說。同樣地，另一本長篇自傳小說《台灣連翹》似乎也繼續沿用《亞細亞的孤兒》的這一段：

《無花果》手稿，頁2的刪文內容：「四五年前金關教授から口口口私に向って、二二八事件に関して日本ではその本當の真相が傳わり口口ないから、君、それで書いたら、どうかと勧められた。そのとき、私は日本は最も自由な立場にあり、客觀的に書けるのにどうして書かないのかと反問したら、教授は二二八事件の起した當時の日本の筆陣はすでに退却した。日本人が書いたもので、事實と喰い違ったところが多い、また大陸で発表したものも見たが、それも政治的に歪められているから、真の姿が描かれていない。と金關教授は私と話した。事件当時教授は台湾に留用されていたので、この話は間違いなかるうと思う。この問題は余にも難かしいので、私はまだ一字も書いていない。しかし、あれからもう五年経ってしまった。もう五年経てばもっと書けなくなる。この中、何となくこれが気になって来た。」根據筆者的檢視，「社會思想社版」的〈無花果〉和「台灣文庫版」的《無花果》、「林白出版社」、「台灣文藝版」的《無花果》皆未見這一段。另外，「戴國輝版」《無花果》手稿中的筆跡問題，前半部是同一個人的筆跡，後半部的又出現三種筆跡和不同人修訂的筆跡。與「社會思想社版」的〈無花果〉交互核對，發現「社會思想社版」的〈無花果〉主要是根據這本手稿本修訂內容打字而成的。但，顧及小說的虛構性，將地名與人的姓氏進行修改，將原手稿「龍潭四方林」的地名改成「平安鎮」。原稿「鍾君」全改成「章君」，「徐君」改成「余君」。鍾君應是指鍾壬壽。

29 感謝張良澤教授提供個人收藏的手稿第一頁照片，在此誌謝。

3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93.03），頁233。

他一面賞玩着無花果，一面散步踱到籬邊，那兒的臺灣連翹修剪得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着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運，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他觸景生情，不覺深為感動。「連草木也知道應該不違背自己的個性去求生存！」<sup>31</sup>

似乎預告了《台灣連翹》的出現，晚年的這兩篇自傳性小說，皆透過植物的生長樣態為喻，猶如在備受政治審查的環境中，吳濁流仍默默地堅持創作的作家姿態。

### （三）初識坂口禰子

在聯繫不易的年代，吳濁流勤於撰寫書信，並依照信封上的住址尋訪友人，但事前若未能聯繫妥當，常會失之交臂。例如 1957 年吳濁流前往熊本觀光時，特地拜訪坂口禰子卻撲空，只聽聞坂口夫婦驟逝的消息。<sup>32</sup> 1965 年訪日時特地前往為《歪められた島》撰寫序文的上村知行住處，希望當面致謝，也同樣撲空，只好寫詩紀念。

坂口禰子戰後在日本文壇以撰寫「台灣蕃地小說」著稱，與台灣關係深厚。戰前兩人素未謀面，1965 年經工藤好美教授的安排，於 11 月 6 日兩人才在東京初次見面，「八載時常信息通／今朝何幸喜相逢」。<sup>33</sup> 除了坂口之外，另一位女性作家內藤壽子也陪同出席。顯然，五〇年代吳濁流曾捎信委請，以小說〈蕃地〉（1953）一作入選新潮社文學賞的坂口協助，找尋在日出版作品集的機會。雖然出版的請託無功而返，但戰後第一次訪日的吳濁流便直奔熊本致意，這就是吳濁流的「人情義理」。兩人在東京見面後，坂口隨即引薦吳濁流與戴國輝認識，開啟七〇年代吳濁流文學在日出版的另一個高峰。

31 同註 30，頁 234。

32 吳濁流，〈八代市訪坂口禰子不遇有感〉，《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 170-171。

33 吳濁流，〈與坂口禰子會見有感〉，《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頁 184。之後，又寫了〈於池袋再與坂口禰子會談〉、〈寄坂口禰子〉。同頁。

#### （四）結識戴國輝

戴國輝在東大就學期間，曾選修東大研究魯迅大家竹內好（1910-1977）的課程「中國近代文學上有關家的諸問題」，竹內建議他要多看日本近代文學有關描寫「家」的作品，藉此與中國近代文學相關問題的進行比較研究。有一天竹內好在課堂上突然詢問戴國輝，在台灣是否有類似的作品？觸發他對台灣文學的興趣。他因此陸續在日本舊書店購入庄司總一的《陳夫人》、坂口禰子的《鄭一家》等小說。在竹內兩年的討論課期間，戴國輝學到運用文學作品來分析歷史和社會中的人文現象。其中，他在認識坂口之後，也積極蒐集坂口有關霧社事件的系列作品，並對坂口進行口訪，投身霧社事件研究。<sup>34</sup>總之，因為竹內好的課堂提問，讓原本只關注經濟史研究的戴國輝，將目光轉移到文學領域，並結識戰前在台日人女作家坂口禰子。

戴國輝回憶吳濁流在日本初次與坂口禰子、中村哲、尾崎秀樹等日本朋友的歡迎餐會上，當時吳濁流謹慎不多話，深懼特務藏在其中，直到戴國輝以客語攀談後，才化解他的警備疑慮。戴國輝認為吳濁流的日文雖然相當不錯，但作為商品化的日本文學作品還是有一段距離的。言下之意，若要將吳濁流的作品集作為「商品」順利在日本販售，需要煞費苦心。但，戴國輝認為吳濁流的日文作品本身就是殖民地傷痕的一部分，刻劃那個年代的無可奈何，應足以成為討論殖民地議題的重要的材料，肯定吳濁流作品集在日本出版的意義與價值。

尾崎秀樹曾在〈決戰下的台灣文學〉（1962）引述《歪められた島》的內容，高見信在〈台灣人の意識の形成〉再轉引尾崎的評述，並將這部作品視為戰後的台灣文學的代表作。

戰爭中撰寫戰後出版的吳濁流的《被扭曲的島嶼》，因吐露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的台灣人苦悶，成為讓台灣人深受感動的著作。「台灣人無論走到哪裡，因為是台灣人而陷於被歧視的處境，特別是在中國盛行煽動排日，台灣

34 林彩美，〈被詰問出來的台灣文學收藏——《陳夫人》、《鄭一家》、《Nagare》〉，《台灣文學館通訊》（2003.12）2期，頁10-11。戴國輝，〈七、「台灣文學」資料的蒐集暨支援尾崎秀樹的傷痕文學研究〉，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6 台灣史探微·歷史研究法》（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頁450-454。

人也不愉快。」、「在東京留學時和南京時期常常被身邊的友人忠告『（和中國人交往時）最好不要說是台灣人』。而且率真的心情自稱：『我是台灣出身的胡志明』，卻遭到蔑視和成為間諜嫌疑者，讓他感到難以言喻的孤獨。」、「前國民政府官員，目前擔任經紀人的李對胡太明說：面對歷史運轉的方向你是無能為力的，譬如你抱持某種信念，做任何事是沒人會相信的，到底就是個間諜，想想你就是個畸形兒吧。」<sup>35</sup>

顯然，高見信將評述聚焦於主角無法找到自我認同的徨徨無助，而非殖民地統治的控訴。在《歪められた島》裡台灣人「想想你就是個畸形兒吧。」，必須隱藏身分，這是身為台灣人深沉的無奈與悲哀。但，此時的台灣人只是個「畸形兒」，「亞細亞的孤兒」被具像化應該是 1972 年台日斷交之後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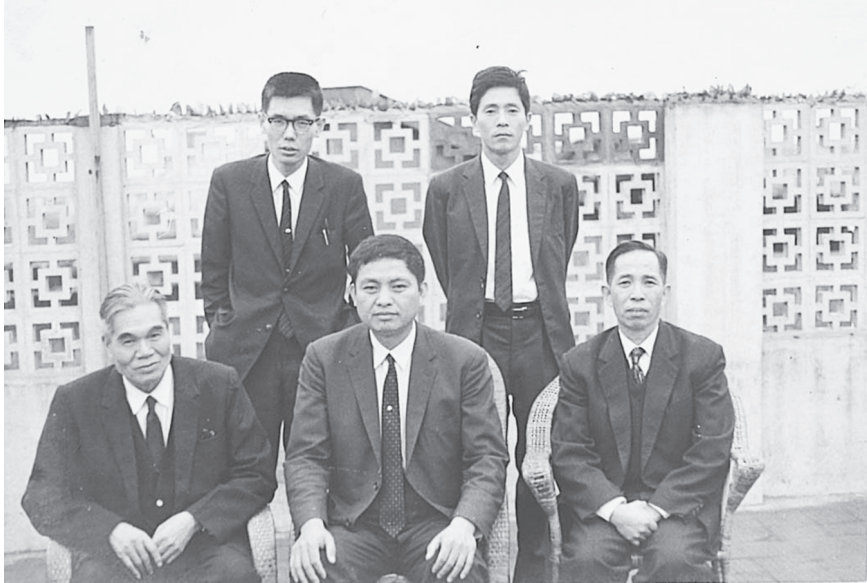
### 三、七〇年代吳濁流作品集在日出版

《アジヤの孤兒》（1956）和改名《歪められた島》（1957）因都出自於日本小型的出版社，在日本並未引起讀者太多的關注。1968 年吳濁流在友人的歡送下，展開他的環球之旅（1968 年 8 月 26 日到 11 月 15 日，共 82 天）完成夙願，旅程詳情皆記載在《談西說東》。1968 年 10 月 25 日他從美國檀香山經過換日線直飛東京，任教於東京上智大學的陳永昌教授和陳萬富為他接機。這趟訪日之行主要的目的之一，<sup>36</sup> 就是尋訪「土田」君（即戴國輝，他當時被列入黑名單）。10 月 28 日隨即前往アジヤ經濟研究所守株待兔，卻因戴國輝出差而撲空，隔日兩人才見到並共進午餐。10 月 31 日再度受戴國輝之邀，前往他川崎市的住家作客吟詩，並回贈墨寶詩作一首。<sup>37</sup> 隔年 1969 年 11 月 16 日至 1970 年 1 月 4 日，戴國輝帶領アジヤ經濟所同仁赴東南亞六國進行調查研究，因駐泰大使彭孟緝的

35 高見信，〈台灣人の意識の形成〉，《台灣青年》39 號（1964.02），頁 36-37。

36 吳濁流，《談西說東》（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69.04），頁 141-161。吳濁流這次訪日日期間的行旅以東京為折返點，北到佐渡島，關西到奈良（見金關丈夫）、中國地方岡山（後樂園）、四國高松（鬼島）等地。

37 林彩美，〈今朝何幸喜相逢——吳濁流的詩與墨寶〉，《台灣文學館通訊》2 期（2003.12），頁 6-7。



前排左起吳濁流、戴國輝、龍瑛宗。後排矢吹晉（右一）和內田進（左一）。<sup>39</sup>

邀請返台，<sup>38</sup> 滯台期間曾與吳濁流、龍瑛宗見面並合照留念。

直到 1971 年東瀛之行（4 月 17 日～5 月 22 日），兩人才正式商討文集出版事宜。根據戴國輝的日記，<sup>40</sup> 可知 1971 年 3 月 11、13 日他與社會思想社編輯田村研平商洽自己的專著《日本人との対話：日本・中国台湾・アジア》，及吳濁流著作在日本出版而見面。1971 年吳濁流 4 月 26 日正式引介吳濁流與田村研平主編見面。4 月 28-30 日與吳濁流、瀧川勉（アジア經濟研究所同事）等人同遊湯河原溫泉，<sup>41</sup> 瀧川後來受託為《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撰寫〈解說〉。1971 年 5 月 3 日吳濁流與竹內好等多位日本文化界人士見面，留影紀念。<sup>42</sup>

38 林彩美編譯，〈生平年表〉，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 27 殖民地的孩子——歷史學家戴國輝》（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頁 87。

39 感謝龍瑛宗文學藝術教育基金會相片授權，謹此誌謝。

40 林彩美編譯，〈日記〉，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 27 殖民地的孩子——歷史學家戴國輝》，頁 142-143。

41 1971 年 4 月 28 日吳濁流旅遊日本與瀧川勉、吳濁流、廖運和、戴國輝合影於湯河原車站前，可參閱張恆豪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2 吳濁流》，頁 25。

42 1971 年 5 月 3 日吳濁流與竹內好、戴國輝、波多野宏一、鶴見良行於飯店的合照，可參閱戴國輝，〈如何克服殖民地傷痕：我所認識的吳濁流先生〉，《台灣與世界月刊》27 期（1985.12），頁 35。

1974年吳濁流最後一趟訪日，5月14日多位日本友人在新亞大飯店設宴歡迎他，與會者有竹內好、《東京新聞》的三浦、新人物往來社資深編輯內川千裕（草風館社故社長）和飯倉照平（1934-2019，東京都立大中國文學教授）、波多野宏一（朝日新聞主筆）、鶴見良行（1926-1994，日本東亞學者、人類學者）等人。其中，內川社長協助重新出版《アジアの孤兒》（新人物往來社，1973），戴國輝撰文〈植民地体制と「知識人」——吳濁流の世界〉解說中最後以「追求世界和平」的大義名分：「對於日本的讀者諸賢，我希望各位把吳濁流先生的作品當作確立亞洲真正的和平，與創造出中日民族應有的新睦鄰友好關係的食糧，並做為理解殖民地體制本質所帶來的人性破壞，與肉眼不見的殖民地體制傷痕的啟蒙書來讀。不是台灣人，正是日本自己在變成亞洲孤兒的危機狀況也正在逼近，因而如此期盼。」<sup>43</sup>這一版本的《アジアの孤兒》才真正在日本廣為流傳。之後，內川也特別跟戴國輝表達願意協助吳濁流出版其它作品集的想法。

七〇年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界的眼光幾乎都投向文革後的紅色中國，出現所謂「中國熱」的現象，陳若曦（1938-）雖是中華民國本省籍作家，但她的小說集《北京のひとり者》（中譯：耿爾在北京，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sup>44</sup>描寫文革時期的中國，該小說集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1923-2013）將其作品譯介後由朝日新聞社集結出版。直到七〇年代末黃春明以台灣社會為小說舞台的《さよなら・再見》（日本東京：めこん，1979.09）日譯本出版後，台灣當代中文小說才正式進入日本讀者的閱讀視域。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松永正義、若林正丈等人，接著陸續譯介台灣文學，1984年出版「台灣現代小說選」系列性書籍，開啟日本戰後台灣文學的閱讀。<sup>45</sup>

戴國輝因獲得吳濁流的信任，利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因日本經

43 戴國輝，〈植民地体制と「知識人」——吳濁流の世界〉，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日本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3.05），頁325-326。

44 竹內實編譯陳若曦的《北京のひとり者》（中譯：耿爾在北京）中收錄〈晶晶的誕生日〉、〈家族調査〉、〈尹県長〉、〈任秀蘭〉、〈北京のひとり者〉共五篇。之後，由鴻儒堂在台灣翻印。

45 葉石濤，〈日本眼中終戰後的台灣文學：《台灣現代小說選》序〉，《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07），頁199-204。

濟景氣，出版社最賺錢的這個時期，把握在日出版吳濁流作品集的機會。<sup>46</sup> 吳濁流積極謄寫日文稿轉交戴國輝，找尋出版作品集的機會。根據筆者調閱中央研究院的「特藏影像系統」的資料可知，<sup>47</sup> 在手稿〈沼の蓮〉（〈沼澤的蓮花〉）上被註明：「讀んだ後、土田博士に保存させて下さい。」（中譯：「讀了之後，請讓土田博士保存」）。〈泥濘〉的第一頁標記：「万一採用されなかったら、次の所に送ってください、東京都新宿区市ヶ谷本村町 42 番地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R.K.Tai」（「如果萬一不採用的話，請寄至東京都新宿区市ヶ谷本村町 42 番地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R.K.Tai」）等註記。但，這批稿件大多是謄寫稿而非創作初稿，因為在稿面上非常乾淨，未見修改痕跡。又〈くらげ〉的文末寫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台湾新（文）学に発表あり」。<sup>48</sup> 〈台湾文学の現況〉的文末也標記：「民国三十七年日本國の雄鷄雜誌に登載せり」，顯見這批手抄稿應該是謄抄自吳濁流已發表過的日文作品。

唯〈無花果〉由於篇幅較長，出現數種謄寫筆跡，若將〈無花果〉的手抄稿（共 238 頁）與「社會思想社版」的印刷本進行初步比較，如下：

《無花果》手稿	《夜明け前の台湾》（社會思想社版）
「光陰矢の如し」この言葉は誰が云ったか分からないが、年をとるに <u>従って</u> いよいよ痛切に感ずるようになった。	「光陰矢のごとし」この言葉だれが言ったか分からないが、年をとるに <u>したがつて</u> いよいよ痛切に感ずるようになった。

可以發現因為吳濁流係屬戰前的日語作家，漢字的使用顯然與戰後的用法不同，為便於戰後日人讀者閱讀，編輯者已經過重新修訂原稿的漢字、用字等問題。另外，誠如上述出版時編輯者直接刪除部分內容或進行微調。例如：原稿頁 6 原提及隔壁的村莊，為「龍潭庄の四方林」（龍潭四方林為實存地名），或許為表

46 戴國輝，〈如何克服殖民地傷痕——我所認識的吳濁流先生〉，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 2 殖民地文學·台灣總體相》（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頁 47-49。

47 中研院贈書人紀念網站（來源：<https://lib.ihp.sinica.edu.tw/03-rare/MWSP/09/a.htm>，檢索日期：2025.03.20）所入藏「梅苑藏書」的資料中，有關吳濁流的手稿原件已建檔於中研院人社聯的特藏影像系統中。

48 〈くらげ〉（水月），《新文學月報》2 號（《台灣新文學》免費贈送同人的刊物，1936.03，未見），是吳濁流戰前的小說處女作。

現小說地方的空間虛構性而刪改成「平安鎮」。又，人名的姓氏問題：原稿中的「鍾君」全部改成「章君」，因兩字日語發音相同，鍾君應是指「鍾壬壽」，至於「徐君」全部改成「余」君，因字形相近，徐君可能是他五湖時代的學生。至於特殊的專有名詞編輯會加括號說明，例如「范將軍、謝將軍（城隍廟の神様）」、「福德正神（地藏）」等。在手稿中的行間，出現不同字跡的簡短補述內容，印刷書一律增補上去。這是在吳濁流授權下，由戴國輝與飯倉照平商討後，在不歪曲原意的情況下加以潤色的結果。<sup>49</sup>但整體而言，作品內容調整的篇幅並不大。另外，編輯部還特地委請竹內照夫在漢詩的下方協助日譯說明，並在每個大段落前加上小標，藉以提示內容。1971年訪日時吳濁流也特地前往靜岡拜會竹內照夫，順道拜訪與《笠》詩刊往來密切的詩人高橋喜久晴（1926-2006）。<sup>50</sup>

《アジアの孤兒》是先在日本出版後才「譯回」台灣，而〈無花果〉是「中譯」後才將日語原稿在日本出版，但卻「宣稱」是「日譯本」。《無花果》中譯本，1968年於《台灣文藝》（第5卷第19-21期）分三次連載，一共分成13章，誠如葉石濤所言：「吳老固然擅長寫漢詩，但他卻不擅於用白話文寫文學作品」<sup>51</sup>〈無花果〉全由《台灣文藝》同仁協助譯出，由鍾肇政（1925-2020）做最後匯整，但並未特別標註譯者。<sup>52</sup>這或許是因吳濁流在戒嚴時期不想連累無辜的譯者，畢竟當時他們都是情義相挺的文友。

《無花果》的譯文於1970年集結成冊，由林白出版社出版，豈知隔年1971年竟遭查禁。根據廖清秀的回憶，這篇作品在《台灣文藝》連載時，並未受到關注，可能是因林白出版社的海報廣告「欲知二二八事變者，請看本書《無花果》」，而遭管區派出所提報警總取締，吳濁流對此憤憤不平，但還是深懼連累

49 戴國輝，〈八、毛遂自薦，當起無酬且匿名的編輯顧問〉，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6 台灣史探微·歷史研究法》，頁455。

50 吳濁流，〈東遊雅趣〉，《台灣文藝》34期（1972.01），頁81。竹內照夫曾在《日本談義》317號（1970.01），頁64-66上發表〈吳濁流の漢詩〉一文，介紹吳濁流的生平與代表作《亞細亞的孤兒》。

51 葉石濤，〈談二二八文學〉，《台灣文學的困境》，頁43-48。

52 杉森藍，「吳濁流作品與《台灣文藝》的譯者們」，〈戰後台灣文學翻譯史（1948-1982）——以跨越語言世代作家的翻譯工作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5.07），頁70-75。由鍾肇政、林鍾隆、廖清秀等人譯出後，刊於《台灣文藝》，譯作分工情況不明。

文友。<sup>53</sup> 其實出版文宣只是以「二二八事變」內容為噱頭，全書真正描寫事件本身只有第 13 章的部分。遭禁後，吳濁流私下仍將這本小說寄贈友人，例如葉榮鐘、河原功等人皆持有這本禁書。

《無花果》這本自傳小說是吳濁流在戒嚴時期試圖以「文學」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探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但仍遭查禁，只好流亡海外迂迴出版傳播。然而，在島內被查禁之前，因戴國輝與「中國の會」的關係，〈無花果〉早已分成五回連載於《中国》（65-69 號，1969 年 4-8 月），並特別插入「作者の紹介」、「作者の著作」、「内台如一」、「はじめての読者に」、「改姓」（小說《アジアの孤児》から）等說明文，第一回甚至轉載池田敏雄的夫人黃鳳姿《七娘媽生》中陳鳳蘭的插畫〈上元〉和〈新娘〉，以期日本讀者能深入了解吳濁流和戰前日本的殖民地政策。

《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的「編輯後記」特別指出〈無花果〉在台灣遭禁的問題。《無花果》在台灣重刊時，張良澤也寫到：「（《無花果》）意外的被日本學者看上眼，譯成日語，另加上小標，連載於當時唯一研究中國問題的全國性雜誌《中国》。」又，「譯文的發表引起日本知識界莫大的關心（迄今尚有不少年輕日本學者提起學生時代讀到《無花果》而留下深刻印象。）」，「該刊遂於第五回連載的同時，接著刊出「台灣高山族的叛亂『霧社事件』」特輯號，把日帝對台的惡政做了一個集中點的批判」。<sup>54</sup> 然而，〈無花果〉之所以在《中国》連載，是戴國輝強力運作的結果，另外，戴國輝也承擔了《中国》「台灣特輯」的編務，試圖利用《中国》這本全國性的刊物，讓日本中國學界重新認識台灣的殖民經驗與抗日事件、國府接收時的二二八事件等，〈無花果〉在日刊行決非是個「意外」。總之，七〇年代戴國輝傾其個人在日本文化界的人脈，積極邀集友人為吳濁流作品集作嫁撰寫書評，藉以提高吳濁流作品集在日本的知名度。

53 廖清秀，〈《無花果》出版與吳濁流老〉，《文學台灣》12 期（1994.10），頁 19-21。

54 張良澤，〈《無花果》解析〉，吳濁流，《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回想》（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2），頁 7-32。

#### 四、〈無花果〉在日本傳播的文化政治

台灣作家在日出版作品集的契機，皆與日本社會對台灣的關注度有關。七〇年代「台灣」之所以浮出日本的輿論界，與當時東亞地緣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1 年 7 月，應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之邀宣布訪中，1972 年 2 月 21 日到訪中國，這是戰後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美邦交正常化跨出重要的一步。日本政府七〇年代積極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管道，另一方面也關注中華民國政府如何應對國際情勢的轉變。雜誌《アジア》在 1971 年 12 月號刊出特集「台灣—知られざる中国の孤島」（中譯：台灣—不為人知的中國孤島），收錄了尾崎秀樹、戴國輝、河原功、坂口禰子等人的專文，<sup>55</sup>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台灣被稱之為「中國的孤島」。隔年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接受一個中國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的外交動向備受日人關注。

斷交前後，吳濁流在戴國輝的協助下，趁機出版了作品集《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和重刊《アジアの孤児》。這些書籍成為戰後在日本理解舊殖民地台灣和戰後台灣社會情況，較易取得的文學文本。然而，這些作品的導讀者、一般日本讀者、在日台籍讀者等，究竟站在怎樣的「立場」，閱讀理解吳濁流文學呢？首先，我們必須先理解七〇年代在日行銷吳濁流文學最重要的人物戴國輝及其他所領導的研究會。

##### （一）戴國輝與「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七〇年代開始研究台灣的日籍研究者幾乎都面臨，日本社會「對台灣的認識幾乎是零」的難題。<sup>56</sup> 「在日」的戴國輝利用他的文化身分，在戰後日本社會積極地介紹台灣，試圖建立台灣的「文化主體性」。戴國輝的學術經歷可分成四期，

55 其中劉文甫以「高山二郎」為筆名，據劉文甫的解釋因為台灣日治時期最高的稱之為新高山，所以以高山為名，這篇文章多虧アジア經濟研究所的同仁協助改稿，二人合作，故稱之為二郎，感謝劉文甫先生贈閱本期《アジア》6 卷 10 號，謹此誌謝。

56 感謝劉文甫先生（龍瑛宗之子）賜教，他曾任亞洲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在七〇年代亦以各種筆名積極撰寫與台灣相關的政經性文章。

第一期：自 1956 年進入東京大學到 1966 年以《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取得農學博士，他主要關注的課題是中國研究。第二期：自 1967 年進入亞洲經濟研究所至他轉任立教大學。第三期：1976 年前往立教大學任教到返台為止。第四期：1996 年返台至 2001 年離世為止。松永正義歸納戴國輝各個時期的特點，認為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戴國輝漸將研究方向拓展至台灣史研究，其重要的學術論文幾乎都完成在這個時期。轉任立教大學後，因他在學界和論壇的地位已穩固，因而事業也走向多樣化，生活更為繁忙並做出許多重要的貢獻。<sup>57</sup> 其中，包括研究會、資料的挖掘出版、二二八研究等集大成，在日本學界針對中國時事問題進行發言等，出現了評論的文量遠勝過他的學術論文的現象，這或許是戰後旅日台灣研究者的宿命。然而，同屬客籍的吳濁流的文集正因他的俠義熱腸，才有機會在日本問世，讓日本讀者看見「台灣」。

戴國輝在第二期很重要的貢獻在於籌組研究會。1970 年 5 月他在亞洲經濟研究所成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聚集四個不同領域當時仍在就學的河原功（1948-，成蹊大學日本文學專攻）、若林正丈（1949-，東大教養學部國際關係）、松永正義（1949-，東大中國文學專攻）、宇野利玄（已故，東大東洋史專攻）。隨之，又成立了「東寧會」，其中包括開始召集當時已經著手研究台灣文學的尾崎秀樹、最早訪問霧社的中村ふじ糸和亞洲經濟研究所同仁小島麗逸、吹矢晉、東大東洋研究所的加藤祐三、戰前在台日人《民俗台灣》的池田敏雄、金關丈夫等人。<sup>58</sup> 1975 年 12 月成立的「後藤新平研究會」，1978 年 3 月 2 日更名重整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當時會員原有 39 名最後增至 54 名，並發行研究誌《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東京：龍溪書舍，1978.04）。<sup>59</sup>

這個研究會維繫了近 20 年，在日本提升台灣研究的質量，培育諸多戰後傑出的台灣研究者。另外，該會也屢屢邀請台灣作家出席，除了日語世代的吳濁流、

57 松永正義，〈戴國輝的位置〉，封德屏編，《戴國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7），頁 353-363。

58 同註 57，頁 358。

59 河原功，〈第一章 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研究・台湾文学研究の系譜〉，《台湾文学研究への道》（日本東京：村里社，2011.07），頁 5-24。《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共發行 6 號（日本東京：龍溪書舍，1978.04-1988.10），第 4 號起改由綠蔭書房出版。

葉榮鐘、楊遠之外，也邀集戰後作家左傾作家陳映真、陳若曦等人與會講演。<sup>60</sup> 其中，之所以邀請葉榮鐘、吳濁流是因他們在台灣參與抗日運動，和抱有台灣知識分子的行動與意識。<sup>61</sup> 另外，同屬客籍的龍瑛宗雖未曾出席研究會，但卻也在雜誌上發表〈《文艺台湾》と《台湾文艺》〉一文（《台灣近現代史研究》3號，1981.01，頁86-89），這個研究會在戒嚴時期是橋架日、台文學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重要成員之一的河原功也憶及，在1971年因客家友人林三妹的介紹下見到吳濁流。之後，1973年訪台時他特地前往位居台北新生南路的住處拜訪吳濁流，並獲贈墨寶和禁書《無花果》中文版。兩人見面時，吳濁流還特別叮嚀他，「《夜明け前の台湾》雖然由東京社會思想社在日出版，但自己畢竟是位無名的作家，或許將如《アジアの孤児》一樣賣不出去，但請介紹給你的同學或朋友們。」<sup>62</sup> 河原功覺得吳濁流即使自知可能銷售不易，但還是希望有機會在日出版，相當有趣。這樣地對自己作品集在日本出版的執著，應該是同世代舊殖民地日語作家共同的悲願吧。

## （二）《中国》雜誌上的〈無花果〉

「中國の會」的《中国》（共110號，日本東京：德間書店，1963.01-1972.12），創刊時由竹內好、尾崎秀樹、橋川文三擔任編輯委員。尾崎因為「灣生」的身分，在戰後日本文化界成為「台灣」重要的代言人，曾在《中国》的「圖書室」介紹〈台灣問題〉，主張應以台灣人的幸福為前提處理「台灣問題」，但又矛盾地認為「台灣問題」應視為中國內政的一環。文中尾崎除了介紹戰前在日

60 同註57，頁358。

61 戴國輝，〈補白〉，《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04），頁174。根據王詩琅寫給葉榮鐘的書信（1972年8月19日），可知同年戴國輝返台參加「海外學人建設研討會」（8月15日至8月28日）期間，於8月26日吳濁流曾邀集兩人到吳宅作客見面。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典藏，典藏識別號：NTH-LIB-001-070400060017（來源：[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UST\\_NTHU:886UST\\_NTHU&collectionId=813671603880006774](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UST_NTHU:886UST_NTHU&collectionId=813671603880006774)，檢索日期：2024.08.07）。

62 河原功，〈第四章 台灣作家覺書〉，《台湾文学研究への道》，頁61-63，目前這幅墨寶「吳濁流致河原功卷軸」藏於新竹縣文化局（來源：[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hchcc\\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EMZMQMW](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hchcc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EMZMQMW)，檢索日期：2024.08.07）因為落款「七十四隻吳濁流」故推測時間應是1973年。

有關台灣的相關著作之外，也提及戰後王育德的雜誌《台灣青年》和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等在日本台獨人士的著作。<sup>63</sup>

戴國輝曾協助《中国》雜誌編輯三次與台灣相關的特刊，第一次是1965年6月《中国》第19號（小冊子）上與尾崎秀樹合著〈台灣小史〉（未署名）。第二次是改版後1969年8月《中国》第69號的「台灣高山族之叛亂『霧社事件』」的特刊，並推薦吳濁流著的〈無花果〉連載，加添副題——「台灣七十年の回想」。第三次是1972年5月《中国》第102號屬名撰寫〈郁達夫與台灣〉，重刊楊達的〈送報伏〉，尾崎秀樹亦撰寫〈台灣出身作家の文學抵抗〉專文介紹楊達的文學生涯，希望藉此讓日本文壇能想起楊達仍健在，<sup>64</sup>1982年8月楊達訪美時路經東京（11月1-13日）戰後首次訪日，接受各界人士訪談，戴國輝亦安排了一場座談。<sup>65</sup>〈無花果——台灣七十年の回想〉連載的期間，編輯部順便推銷刊物「台灣關係記事の掲載号ご案内」（《中国》第19號和第63號）。<sup>66</sup>另外，《中国》第66號也轉載大谷律子的第二次訪台的紀行文，他認為當時台灣社會氣氛並未見太大的改變，在台北仍可見整群的阿兵哥在街上走動，大谷向友人幾番探詢原因，讓他深覺當時真的是台灣人權的黑暗時代。另外，他也難以認同當時所謂自由的日本當局以交換煙毒犯為由，強制遣返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幹部柳文卿，同情台灣人的處境：「台灣似乎是一個悲劇的島，如果要談理想，還是獨立吧」。<sup>67</sup>

〈無花果〉連載後，《中国》讀者投稿欄「風」上陸續刊出讀者的迴響，包

63 尾崎秀樹，〈台灣問題〉，《中国》6期（1963.06），頁21。

64 戴國輝，〈八、毛遂自薦，當豈無酬且匿名的編輯顧問〉，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6 台灣史探微·歷史研究法》，頁454-455。

65 這場訪談由內村剛介先生主訪，戴國輝記錄，〈楊達憶述不凡歲月——陪內村剛介先生訪談楊達於日本東京〉，黃惠禎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4 楊達》（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153-181。

66 除此之外還有井下田猛的〈台灣の文通〉，《中国》68期（1969.07），頁72-73。主要報導曾在台南州曾文郡麻豆街的土屋夫婦戰後繼續與台灣學生往返書信的內容。

67 大谷律子，〈大きな声では言えない〉，《中国》66期（1969.05），頁3。這個強制遣返台灣事件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成員激烈地營救，NHK的披露和朝日新聞的報導，引起日本社會高度的關注。救援的一行人被日警抓到拘留所，最後以不起訴處分，但柳文卿最終還是被日本遣送回台並被軟禁。

括楊逸舟（1909-1987），<sup>68</sup>文中他提到：

這次的《無花果》比上一回有趣多了，我帶著緊張感讀完了。吳先生辭職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也是這一章的亮點。沒有什麼比人生去留更重要的事了。吳先生的辭意甚堅，描寫日本與台灣兩個民族鬥爭中的一枚棋子。在日本（台灣）這個法治國家內是不會那樣做的。但在蔣介石政權下亂七八糟，一點小事就可能就會被殺害。<sup>69</sup>

楊逸舟所指的內容是小說的第七章「到辭去教職為止」，這一章主要是描寫「古君」因不甘在新埔的運動會上，本島人教師遭日本視學敲頭，向新竹州知事抗議無效後，憤而辭職的原委。楊最後仍不忘藉機批判在台蔣氏政權的威權專政。

接著，日人久米茂<sup>70</sup>也在讀者投稿欄「風」作出回應：

我也很喜歡這期吳濁流的文章。我很想一讀他寫的報紙。日本有《大陸新報》、《興南新聞》、《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紙嗎？請告訴我。我很想一睹為快。我最感興趣的是第67頁上半部標題為「對知識分子的處罰等等」的部分。我希望他寫得更多。這是戴季陶的文字所沒有的。非常好。這篇文章讓我喜歡上台灣的中國人，期待下一期。在濁流先生尚健在之時，想見見他。即便如此，台灣中國有多遠呢？

其中第67頁上半部標題為「對知識分子的處罰等等」的部分，應是指「四 故郷の分教場で人生問題に悩む」（中譯：在故鄉的分教場煩惱人生問題）的內容。

68 楊逸舟（1909-1987），本名楊杏庭，曾於1970年在日出版《台灣と蔣介石 二二八民変を中心に》（日本東京：三一書房）的「作者前言」向竹內好致意，兩人應有私交。

69 楊逸舟，〈阿片政策のことなど〉，《中国》67期（1969.06），頁87。

70 久米茂，〈「沖繩通信」を読んで〉，《中国》68期（1969.07），頁82-83。另外，久米茂也在《中国》「日本の中の中国」系列連載中撰寫〈台灣少年工の碑〉，《中国》69期（1969.08），頁58-60。

小說描寫日人的各種歧視行為總是挑動主人公敏感的神經，其中主要是因主角與日本女教員親近，竟遭無妄之災，被貶調至偏鄉。顯然，上述的兩位讀者對小說描寫殖民地歧視問題，最能產生共鳴。

在〈無花果〉第五回連載時，同時刊出戴國輝編輯的「特輯 台湾高山族の反乱『霧社事件』」刊出 30 年前現地報導的史料，再現抵抗日本殖民的支配和不為人知武裝暴動的全貌，其中包括坂口禰子的〈一九四五年の彼ら—霧社の思い出—〉（中譯：「1945 年的他們——霧社的回想」）。主編戴國輝認為雖然日本人現在仍深信日本過去的台灣統治是成功的，但就歷史的反思而言，這個事件的涵意是很深刻的，因此希望藉由這個特輯，讓日本讀者了解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罪責。

《夜明け前の台湾》出版後，戴國輝隨即在日主流的綜合雜誌《中央公論》上撰寫書評，<sup>71</sup> 其中說明原書名並沒有副標題「來自殖民地的控訴」，是為了出版考量加上去的，最後說明：

作者並非是控訴日本人，是因為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人大多辭世、隱居或是轉業，曾是目擊記者的他，擔心事實被扭曲，而開始撰稿大膽率直地揭露事件真相。

與其說這部是小說設定日本讀者最感興趣的內容，描寫殖民時期被支配者和殖民者之間的心理糾葛的部分，不如說是為了釐清二二八事件的遠因而寫的作品。（中略）對日本人來說，這無疑是一本沉重的讀物。然而，小說中隨處穿插作者的中國漢詩（竹內照夫教授譯），讓我們領略到在凜冽的風雪中，無限的人間浪漫，令人感到安心。

說到台灣人的聲音，那些只聽得到「台獨運動者」聲音的人，以及那些至今仍然認為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沒有做錯的老好人們。我想這本書應該讓你們深刻了解到殖民統治帶給人性的破壞。如果能同時判讀台獨運動只不過是日本統治下創造的“存在”的話，作者將會很開心。（筆者自譯）

71 戴國輝，〈殖民地統治と人間破壊〉，《中央公論》87 卷 9 號（1972.09），頁 311。

日本與國府斷交，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日本反蔣獨裁的台獨運動者或許受到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因此，戴國輝在此特別強調，希望透過吳濁流的作品讓「認同祖國」的台灣人的聲音也可以被聽見。台灣人的認同問題，因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離間，「原本是中國人一部份的台灣人，將他們逼到日本與中國的夾縫中，使之成為悲劇的主角。另一方面也讓台灣民眾和正陷於近、現代化苦鬥中的中國大陸民眾分離。結果讓部分對中國缺乏認同感的台灣本地的資產階級，甚至形成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土壤。」<sup>72</sup>總而言之，戴國輝將在日本發展的台獨運動，視為日本殖民地傷痕的結果和台灣內部民族、階級的問題。

尾崎秀樹負責為《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撰寫解說，他將〈無花果〉置於「殖民地傷痕」的框架中展開論述：

〈無花果〉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讓我們回想起過去殖民統治時代傷痕的作品。（中略）以這樣的意識為基礎，本書將時間從日據時期追溯到解放後的2月28日的事變，其時代見證的意義就在於釐清事情的真相。

在讀吳濁流的〈無花果〉時，我思考著日本的殖民統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日本統治如何干預台灣知識分子乃至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我想仔細了解箇中的樣貌。日本如果不反思這一點，未來與亞洲各民族的友好關係就無法建立。

邱永漢也寫過一本有關於2月28日事件的小說。然而，吳濁流認為這起事件源自於民眾的自衛意識，是自發的，他的觀點應是正確的。可見，從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抱著憧憬迎接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是可以理解，但因此他們也受到很大的挫折。政治和經濟因素應該基於此來考量才是。從二戰日本戰敗到二二八事件歷史的曲折面，不盡然陷入主

72 戴國輝，〈吳濁流『夜明けの台湾』ほか〉，河原宏、藤井昇三編集，《日中關係史の基礎知識：現代中国を知るために》（日本東京：有斐閣，1974.07），頁321-322。戴國輝受邀參加「詞條」的撰寫，介紹吳濁流的作品，只是編者將這個詞條放入戰前「昭和研究会・東亞協同論」的大標題內，似乎有些突兀。

觀判斷進行描寫，我想這是這部長篇的意義之所在。（中略）。對於在殖民地長大的我來說，吳濁流的文學就像是一面鏡子。<sup>73</sup>

尾崎文中一再肯定吳濁流透過文學作品試圖釐清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及其扮演歷史見證者的角色，同情地理解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因出自於自衛的自發性抵抗，及其面對國府政權的挫敗和幻滅感。

瀧川勉雖負責《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中的作品解說，但他也提及了〈無花果〉一作：

這個事件（筆者案：二二八事件）是同是中華民族的同胞，雙方血洗的不幸事件。然而這事件的發生與日本帝國主義脫不了關係。同屬中華民族在感情卻疏遠的要因之一，是出自於日本殖民地統治。這種事實，應該可以透過這部作品強烈地感受得到。可是作者在這部作品中並未責怪日本人。反而對於在臺灣迎接敗戰的日本民眾，特別是婦孺抱以同情的眼光。對於作者這樣寬宏大量，公正的態度讓我心頭不禁湧上溫暖。<sup>74</sup>

瀧川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日本殖民地統治造成的結果，抱著懺悔觀解讀這篇作品。除了上述的兩位，另一位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矢吹晉也在《週刊東洋經濟》（通號 3758，1973.09.01）撰寫書評介紹，細數他與吳濁流的往來情形，同時批判日本人的對台認知上的問題。

在日本有不少人認為，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台灣問題」就算解決了。但是，難道承認一個中國，就可以將生活在台灣的民眾置之不理嗎？即使訪問台灣和研究台灣被視為禁忌的扭曲意識得以改善，但跋扈地聲稱「成功的殖民統治」的矛盾並未改變。透過吳濁流的三冊著作將可以進一步

73 尾崎秀樹，〈吳濁流の文学〉，《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頁 303-319。

74 瀧川勉，〈植民地統治下の台湾民衆の諸相〉，吳濁流，《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の民—》（日本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11），頁 272-273。

了解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sup>75</sup>

矢吹晉七〇年代初中華民國的外交困境相當同情，肯定這本書當時在日本出版的意義與價值。他與吳濁流互訪多次，兩人甚至還曾在新加坡見面。他除了介紹《アジアの孤児》之外，還介紹作品集中六篇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無花果〉：

〈無花果〉中「我」的歷程出乎意料地與日本統治的歷史，從興盛到滅亡疊合，作為時代的證言是一個極其有趣的故事。大家應該都覺得，作者準確的歷史眼光隨處可見，對扎根大地的中國人民的強大令人感到訝異，並感受到作者親切的個性。

同時，若是想到將台灣問題視為禁忌的事大主義・威權主義蔓延，另一方面民眾不在的台灣論橫行。在這樣的狀況中，我希望接下來引用的每一段有更多的日本民眾認真對待。<sup>76</sup>

文中矢吹有關〈無花果〉的引文內容，主要強調主人公抱持的義民精神，「鄉土愛」、「祖國愛」的民族意識，將小說人物視為「扎根大地的中國人民」。矢吹雖然正視「台灣問題」批評事大主義者，但還是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解讀〈無花果〉，試圖理解文本中吳濁流所描寫有關台灣人的歷史傷痕（殖民經驗、二二八事件）與國族認同的糾結。

### （三）獨派在日刊物《獨立台灣》與《台灣青年》

相較於上述日人的評述，在日本台獨派刊物和讀者又是如何理解〈無花果〉呢？

75 矢吹晉，〈日本にとって台湾の重み——吳濁流の作品が語るもの〉，《チャイナウオッチ 矢吹晉著作選集4》（日本東京：未知谷，2022.10），頁7。

76 同註75，頁17。除了上述的〈無花果〉之外，文中上提及〈アジアの孤児〉、〈陳夫人〉、〈夜明け前の台湾〉、〈ポッター科長〉、〈泥濘〉。另外，「事大主義」是指是東亞一些小國以服從大國來保存自身的一種意識型態，與朝貢秩序相關，通常出現在屬邦與宗主國之間，此處是指當時中日關係。

《獨立台灣》的編輯史明直接將刊於《台灣文藝》的〈無花果〉譯作直接原版分成三回轉刊在《獨立台灣》（45-47期，1972.05-07）上。這本刊物之所以轉載這篇小說，是因為「最後面的部分敘寫二二八大革命的事情，全書都是根據他個人的經驗的。據說該書已於去年被蔣政權列為禁書。」<sup>77</sup>因為是「禁書」反而令人更加好奇。

《獨立台灣》（1967.01-1976.06，共89期），是日本東京台灣獨立運動團體發行的雜誌，由史明（1918-2019）主編。從《獨立台灣》43期開始，雜誌封面冠上「台灣人民解放革命機關誌」的標語，以「台灣民族主義」作為運動的中心思想。根據史明回憶，當初辦雜誌是為了要啟蒙台灣人，雜誌每期印製三千本，最多曾印製七千本。雜誌一部分寄送到幾個獨立台灣會的海外據點，一部分郵寄給留日台灣人，另一部分則透過史明培訓的地下工作人員，將雜誌夾帶回台灣。<sup>78</sup>

〈無花果〉在《獨立台灣》刊出後陸續收到「讀者來信」的讀後感，例如阿雄的投稿。

吳濁流先生以台灣人的鄉土感情寫的「無花果」，雖然只刊了三分之一，卻使人十分親切感動。但是在文中所述日本人欺壓台灣人，台灣人對於漢族祖國的懷念，客家義民廟與福佬之爭戰等等，皆是今日台獨運動須要徹底檢討的問題。更有趣的是文中說的“大國民”“×狗”正就是現在投敵的辜寬敏的父親大台奸辜顯榮，五十多年前的歷史重演，辜家真是父子大台奸的家庭，……！<sup>79</sup>

阿雄只讀了小說內容的三分之一，將閱讀重點放在台灣人懷念祖國和島內閩客族裔衝突的刻劃上，話鋒一轉諷刺日治時期被稱為台奸的辜顯榮，批評辜寬敏。

77 編者，〈提供「無花果」全文的 C.S.W. 同志來信一節〉，《獨立台灣》45期（1972.05），頁 B23。

78 史明口述訪談小組著，〈從《獨立台灣》到獨立台灣會〉，《史明口述史二 橫過山刀》（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3.01），頁 84-91。

79 阿雄，〈讀者來信〉，《獨立台灣》47期（1972.07），頁 5。《獨立台灣》係因在日發行，雖是中文文章但多借用日文漢字，引文時筆者將一律改為繁體漢字，若見錯別字，將直接勘誤，不再逐一說明。一般台獨刊物的撰稿者為避免惹禍，多使用筆名。

相較於此，沈安庭則在讀完〈無花果〉全文後才撰寫長篇讀後感，<sup>80</sup>其中提到幾個重點。首先指出是雖然從父執輩言談中耳聞過二二八事件，但因這本小說是台灣的故事，所以特別吸引他。其次是關於書名〈無花果〉，他的朋友認為「無花果」是指「二二八」雖然沒有開花，但暗示未來將會結果實的。但，若細究小說的描寫，主人公是抱持隱世的人生觀，如「無花果」般隱身於樹葉下默默結果。作者對於吳濁流的創作精神甚感佩服。

在獨裁暴政底下，吳先生冒險來寫這本書，他的勇氣與用心實令人欽佩。「無花果」一書可以說是由許多反抗殖民統治底下的差別待遇的故事而成的，這種差別待遇，除了日本統治時代的御用紳士及蔣政權底下的資產階級，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大眾都曾親身體驗過。這便是許多人讀了「無花果」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的原因。

他也肯定主角的客家「硬頸精神」和描寫台灣移民社會的墾拓精神：

他有一個特性：不留戀於「金飯碗」，為了保持個人的獨立人格與尊嚴，他不斷地反抗，不斷地碰釘子，但仍不斷地嘗試，這種不屈的精神，可以說是移民的「開發精神」的延伸。一個地方的移民為了求生存，求發展只有不屈一途，如果屈服了，便會在新的社會裡消滅或是回到舊社會中當奴隸。台灣人的祖先便是極富有「開發精神」的移民。我卻覺得我們應該珍惜，更進發揮，祖先遺傳下來的「開發精神」，吳先生走過的人生，是一個充分發揮開發精神的具體表現。

接著，他肯定作品中表現台灣人解殖的反抗精神：

---

80 沈安庭，〈《無花果》讀後感〉，《獨立台灣》54期（1973.02），頁28-29。沈安庭的身分不詳，這個名字曾出現在史明的聯絡名簿中。（參考政治大學圖書館的「史明文庫」）。

吳先生除了要將他所見的「二二八」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不惜花了許多精力從日本據台開始寫起，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中略）無論是在統治之下，或是在蔣政權統治之下，台灣人繼續不斷反抗殖民統治，二二八其中一次規模宏大的武裝革命。它是台灣人民要從殖民統治之下謀求自我解放的一次英勇表現。<sup>81</sup>

沈安庭在這篇文章中除了肯定〈無花果〉中彰顯的作家精神，和台灣人面對統治者反殖民謀求自我解放的精神。

除此之外，王育德亦在主編的《台灣青年》上連載評論吳濁流在日出版的三冊作品集的書評連載於《台灣青年》（167-169號，1974.09-11）之上。《台灣青年》創刊於1960年4月，直到2002年6月停刊，共發行500期。雜誌每期按月出刊，以留學生及海外僑胞為主要閱讀群，撰稿者皆是當時的海外留學生。《台灣青年》雖是一份政論性的刊物，但內容相當多元豐富，其中包括評論、報告、見聞記、翻譯、小說等。解嚴時期在日本積極關注、譯介報導台灣島內政治社會情勢等變化，由於內容文章質量均佳，曾是日本台獨運動相關的重要日語刊物。

在書評中王育德除了簡介小說梗概之外，同時也關注日本文化人的解讀方式，試圖進一步與日本文化界展開對話，在日提供另一種台灣讀者的讀後感。他首先針對《亞細亞的孤兒》拋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主角必須隱藏台灣人的身分？」。他認為台灣人無法光明正大地當「台灣人」，是作家最悲痛的控訴，日本讀者不應該充而不聞。他批評矢野峰人、中村哲皆未觸及這個核心問題，殖民文學研究大家尾崎秀樹的〈序文〉中，也是三言兩語帶過，並未正面回應，令人感到失望。又，日人評論者（所謂進步的文化人）只批判因日本統治所產生的殖民問題，但對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的矛盾問題並未多談，只選擇在吳濁流作品集的副標上做文章，例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來自殖民地的告發」、「苦惱的台灣人民」。但，若要揭露殖民地傷痕，其實戰前其他台灣日語作家所揭露的殖民地苦悶和文學技巧遠勝於吳濁流。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若要進行戰後自

81 沈安庭，〈《無花果》讀後感〉，《獨立台灣》54期，頁28-29。

省，為何僅只肯定吳濁流的作品？他認為那是因為吳濁流是戰後仍活躍文壇的現役作家，頻繁造訪日本結識日本文化界夠份量的進步文化人的關係。

但是，王育德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作品中所揭示的「中國人意識」，經常提及「祖國・中國」，這對高唱「台灣隸屬於中國」的日本進步文化人而言，是相當便於利用的。<sup>82</sup> 王育德的書評〈「台湾人の身分をかくさねばならぬ」ことについて—吳濁流評 その一—〉（中譯：非得隱藏台灣人身分不可——評吳濁流（1））刊出後，S氏隨之投書提到，「過去不太了解吳氏的立場，又覺得戴氏的說法很可疑。承蒙你的說明，才得以明快掌握狀況。只是你的高論無法在日本人看得到的地方發表，令人遺憾。」<sup>83</sup> 的確，相較於戴國輝刊於《中央公論》的書評，《台灣青年》的讀者數和聲量顯然遠遠不如前者。

王育德也精準地掌握吳濁流文學表現上的優缺點：「我一方面對吳氏做為一個文學家的想像力、構成力及技巧，產生懷疑，但另一方面對於其作品中的一字一句，又覺得血脈賁張感動不已！」<sup>84</sup> 只是吳濁流想控訴的是，台灣人渾身血污的苦悶，但日本進步的文化人在承認殖民統治扭曲台灣的歷史罪責後，卻單純地認為只要台灣回歸祖國（解放統一，顧及吳濁流未明言），「台灣問題」便能迎刃而解的謬思。

王育德也指出日人針對吳氏的這番記述（按：描述戰後初期中國接收人員的素質問題），瀧川勉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與此事件不無關係，同屬中國民族卻在感情上相互背離，其要因之一即是來自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泥濘に生きる》，頁 272-273）。對此王育德略帶情緒性地反駁「簡直是廢話連篇」，表達對「日本的進步文化人」未能正視「中國人」在台灣造成種種問題的不滿。

至於篇名以「無花果」命名，王育德認為吳濁流是位「充滿勇氣與自信的菁英份子」，對台灣文化有使命感，有骨氣的人。他即使被「無花果」吸引，但「扶

82 「《夜明け前の台湾》と《泥濘に生きる》の二冊が日中復交の前後に翻訳出版されたのは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い。」王育德，〈「台湾人の身分をかくさねばならぬ」ことについて—吳濁流評 その一—〉，《台灣青年》167 號（1974.09），頁 10。王育德也誤認《夜明け前の台湾》、《泥濘に生きる》為譯作，而是吳濁流的日語原稿。

83 S 氏，〈読者の便り〉，《台灣青年》168 號（1974.10），頁 27。

84 同註 83，頁 10。

「桑花」同樣也讓他依戀不捨。最後，他指出島內的族群問題，「希望吳氏能站在客家系的立場直言不諱，徹底論析客家系與福建系間存在著何種問題。這些問題長久以來客家系、福建系雙方均避而不談。現在的吳氏應該能夠暢所欲言，它對將來的台灣將是最好的教訓！」<sup>85</sup> 台灣內部族群問題與上述阿雄的讀後感一樣，關注到吳濁流文本中描述的客家墾拓經驗與客籍身分的問題，這是在日本的台籍讀者關注的重點之一。然而有關台灣客家意識的問題，需要等到解嚴後族群運動的展開，才在台灣社會重新被正視討論。王育德以「在日」的日語讀者作為書評主要的對話對象，積極想建立「台灣人」的主體論述。

綜上所述，吳濁流文學在日的出版傳播與理解閱讀，與七〇年代台灣的外交處境有著密切的連動關係。對吳濁流文學評論者的閱讀理路與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有很大的歧異。祖國派的戴國輝所委請的日人解說導讀者，即使是「灣生」尾崎秀樹也是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反省因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罪責，及台灣人的殖民地傷痕，同情地理解「二二八事件」的不幸。然而，台獨派的讀者則側重控訴批判在台的中華民國政權，對小說中標榜的反抗精神給予高度的評價。

在戒嚴時期無論祖國派的戴國輝或台獨派的王育德等人，有關吳濁流文學的評述，若在台灣島內都會觸犯「左派親共」和「台灣獨立」的政治禁忌，唯有「在日本」他們才能自由地放膽地各抒己見。就「祖國·中國」而言，吳濁流所認識的「祖國」是國統區和中華民國政權，戴國輝的「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王育德的「中國」是當時蔣氏政權的「中華民國」政權。他們對於「國族認同」的解讀呈現各自表述的狀態。王育德的「台灣人」只是個泛稱，並未處理台灣閩、客族裔之間的問題，但《無花果》的台灣人抗日經驗主要還是以客家人的歷史經驗為主述內容。總之，王育德與戴國輝的政治立場與國族認同，相去甚遠。但，兩人同樣試圖在戒嚴時期「自由的日本」找尋「台灣」的發聲位置，期待「台灣人」的處境和外交困境能夠被受日本社會民眾的關注理解。

---

85 王育德，〈觀念的中国人と真实的台湾人のあいだ—吳濁流評 その三一〉，《台灣青年》169號（1974.11），頁8-21。

根據〈無花果〉在日本出版、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諸多評述，可以發現吳濁流文學詮釋的多義性，及其蘊含的文化政治性。

## 五、結論

五〇年代吳濁流幾經努力，在日出版日語作品集，開啟戰後日台第一波的文學交流活動。吳濁流的《アジアの孤兒》和《歪められた島》在日本得以順利出版主要是，仰仗吳濁流戰前任職於南京《大陸新報》的同事上野重雄、中澤富美雄及神田孝一等人的協助。他們戰後返日繼續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在中澤的協助下，《アジアの孤兒》於1956年才順利出版。中澤逝世後，改由神田接手，將小說更名為《歪められた島》重刊。《歪められた島》發行後，吳濁流雖透過各種關係邀集多位學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撰文推薦。但，當時吳濁流在日本畢竟只是位「默默無名的前殖民地作家」，這本控訴日本殖民統治和刻劃台灣人認同苦惱的自傳小說，並未引起日文讀書界太多關注。但，他在多位戰前日本友人鍥而不捨的協助下，總算一償在日本出版作品集的夙願。

七〇年代台灣的蔣氏政權經歷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後，台灣成為「國際孤兒」。台（中華民國）日斷交前後，日本政界的台灣派和親中派相互角力，「台灣問題」重新受到日本媒體輿論高度的關注。因此，此時吳濁流再次找到在日出版的歷史縫隙，小說書名由《歪められた島》再改回《アジアの孤兒》，呼應台灣當時的外交處境。戴國輝在日本傾其全力運作，使得吳濁流一口氣在日出版了三冊作品集，提高了吳濁流文學在日的知名度，這些作品集也成為七〇年代日本讀者認識台灣殖民經驗與戰後台灣政治社會的重要讀本。

因戴國輝的轉介〈無花果〉先在日本知名的中國研究刊物《中国》連載，之後再收入於《夜明け前の台湾》進行二次傳播。小說內容因涉及戰後「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在台灣島內被列為「禁書」輾轉流亡海外，反而引起一些戰後被遣返的在台日人讀者和海外台灣人高度的關注。《中国》的編輯部或許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聲稱〈無花果〉是譯作。但，經筆者確認，這篇連載作品是戴國輝收到吳濁流的謄寫稿後，獲得授權將〈無花果〉日語手抄稿重新修訂，加上

小標等編輯而成的，並非是「譯稿」。之後，吳濁流繼續寄送自己作品的日文謄寫稿給戴國輝，希望他集結成冊在日出版。當時日本的輿情對於台灣的外交處境深表同情，加上七〇年代出版景氣，戴國輝發揮他在日本文化界的推播能力，趁機在日出版吳濁流的作品集。

當出版品進入讀書市場後，吳濁流文學中的「孤兒意識」、戰前的受殖經驗與揭露戰後的二二八事件等內容，仍待評論者解說。因此，評論者依據各自不同的「立場」，各自解讀吳濁流文學作品〈無花果〉。這篇作品在《中国》上刊出後，讀者對於文中台灣人所遭受到的歧視問題產生一些共鳴，尾崎秀樹將〈無花果〉置於「殖民地傷痕」的框架中解讀，這篇重要的日文評述，吳濁流特別委請葉石濤中譯「解說」，葉石濤「加值」在文末重新介紹尾崎秀樹給戰後的中文讀者，將他迎回台灣文化界。又，東南亞農業經濟專家瀧川勉因其農業經濟研究的背景，他的解說中將吳濁流的鄉土描寫置於「農民文學」脈絡中理解，將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歸咎於兄弟鬩牆，和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

在日本台獨派的刊物《獨立台灣》直接轉載《台灣文藝》的中文譯作，讀者對於吳濁流不畏強權寫出二二八事件真相，展現反抗的政治意識，給於高度的評價。然而，王育德卻對作品中的將祖國意識和二二八事件被單純地解讀為日本殖民統治的罪責，而未將追究中國政權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甚感不滿，提出諸多質疑。就作品的文學表現，他肯定吳濁流在小說中對台灣殖民地社會的描寫和民族情緒的渲染力。但因吳濁流粗枝大葉的個性，使得小說結構鬆散與欠缺文學藝術性稍有微詞，的確，這些問題一直是吳濁流作品常被詬病之處。七〇年代吳濁流作品集在日出版與傳播本身即是一種文化政治，其中糾結著冷戰時期東亞地域政治下中、日、台的外交角力、戰後日本社會面對殖民統治的歷史罪責的態度、戰後在日台灣人的祖國派和台獨派國族認同的歧異等問題。

吳濁流的《無花果》流亡海外在日本出版後，繼而在「海外華語刊物」之間轉載，遠渡太平洋跨越國境直達美國僑社和台美人社群，成為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台灣文藝》上連載的〈無花果〉中文譯稿並無小標題，日文原稿中也未有小標，直到《中国》雜誌連載的〈無花果〉才加上小標題。台灣出版社在

美國出版的《無花果》中譯版受其影響也同樣加上小標，但與日文版略有不同。在日、美輾轉出版的《無花果》在 1984 年才回到故鄉台灣，林衡哲的解說中闡述《無花果》在美出版的意義。<sup>86</sup> 然而，吳濁流作品《無花果》在日本的出版與傳播的文化政治，顯然不只是作家個人作品在海外出版的個別問題，而是透過這個個案剖析進而讓我們重新認識，冷戰時期台灣文學海外流亡的傳播軌跡，及其呈現的文化現象。



---

86 林衡哲，〈三讀無花果〉，吳濁流，《無花果——台灣七十年之回想》，頁 231-255。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著，《史明口述史二 橫過山刀》（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3.01）。
- 矢吹晉，《チャイナウオッチ 矢吹晉著作選集4》（日本東京：未知谷，2022.10）。
-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卷6 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 ，《吳濁流選集二 漢詩・隨筆》（台北：廣鴻文出版社，1967.04）。
- ，《アジアの孤児—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日本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3.05）。
- ，《アジアの孤児》（日本東京：一二三書房，1956.04）。
- ，《談西說東》（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69.04）。
- ，《泥濘に生きる—苦悩する台湾民—》（日本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11）。
- ，《風雨窗前》（苗栗：文獻書局，1958.05）。
- ，《無花果——台灣七十年代的回想》（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2）。
- ，《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日本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06）。
- ，《亞細亞的孤児》（台北：遠景出版社，1993.03）。
- ，《亞細亞的孤児》（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07）。
- 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04）。
- 河原功，《台湾文学研究への道》（日本東京：村里社，2011.07）。
- 河原宏、藤井昇三編集，《日中関係史の基礎知識：現代中国を知るために》（日本東京：有斐閣，1974.07）。
- 封德屏編，《戴國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7）。
- 張恆豪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2 吳濁流》（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
-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 日本語版》第一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
- 黃惠禎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4 楊逵》（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
-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07）。
- 戴國輝、封德屏主編，《戴國輝全集2 殖民地文學・台灣總體相》（台北：文訊雜誌社，

2011.04)。

——，——，《戴國輝全集 6 台灣史探微·歷史研究法》(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

——，——，《戴國輝全集 27 殖民地的孩子——歷史學家戴國輝》(台北：文訊雜誌社，2011.04)。

## 二、論文

### (一) 期刊

久米茂，〈「沖繩通信」を読んで〉，《中国》68期(1969.07)，頁82-83。

——，〈台湾少年工の碑〉，《中国》69期(1969.08)，頁58-60。

大谷律子，〈大きな声では言えない〉，《中国》66期(1969.05)，頁3。

井下田猛，〈台湾の文通〉，《中国》68期(1969.07)，頁72-73。

王育德，〈「台湾人の身分をかくさねばならぬ」ことについて—吳濁流評 その一—〉，

《台湾青年》167號(1974.09)，頁10。

——，〈觀念的中国人と真实的台湾人のあいだ—吳濁流評 その三—〉，《台湾青年》

169號(1974.11)，頁8-21。

王惠珍，〈龍瑛宗與新竹地區藝文人士的社群網絡研究〉，《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9期

(2023.02)，頁49-78。

竹内照夫，《日本談義》317號(1970.01)，頁64-66。

吳濁流，〈台湾文学の現況〉，《雄鷄通信》通卷39號(1949.01)，頁14。

——，〈東遊雅趣〉，《台灣文藝》34期(1972.01)，頁81。

——，〈東遊雜感〉，《經濟論壇》113號(1966.04)，頁27-33。

——，〈東遊雜感〉，《台灣文藝》3卷17期(1966.10)，頁47。

尾崎秀樹，〈台湾問題〉，《中国》6期(1963.06)，頁21。

沈安庭，〈《無花果》讀後感〉，《獨立台灣》54期(1973.02)，頁28-29。

林彩美，〈今朝何幸喜相逢——吳濁流的詩與墨寶〉，《台灣文學館通訊》2期

(2003.12)，頁6-7。

——，〈被詰問出來的台灣文學收藏——《陳夫人》、《鄭一家》、《Nagare》〉，《台

灣文學館通訊》2期(2003.12)，頁10-11。

河原功，〈吳濁流《胡志明》研究〉，《台灣文學研究》10期(2007.06)，頁77-110。

阿雄，〈讀者來信〉，《獨立台灣》47期（1972.07），頁5。

高見信，〈台灣人の意識の形成〉，《台灣青年》39號（1964.02），頁36-37。

楊逸舟，〈阿片政策のことなど〉，《中国》67期（1969.06），頁87。

廖清秀，〈《無花果》出版與吳濁流老〉，《文學台灣》12期（1994.10），頁19-21。

編者，〈提供「無花果」全文的C.S.W.同志來信一節〉，《獨立台灣》45期（1972.05），頁B23。

戴國輝，〈如何克服殖民地傷痕：我所認識的吳濁流先生〉，《台灣與世界月刊》27期（1985.12），頁35-41。

——，〈補白〉，《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04），頁174。

——，〈植民地統治と人間破壊〉，《中央公論》87卷9號（1972.09），頁311。

豐田周子，〈『胡志明』から『アジアの孤児』へ—その改編をめぐる—〉，《東洋文化研究》12號（2010.03），頁33-65。

S氏，〈読者の便り〉，《台灣青年》168號（1974.10），頁27。

## （二）學位論文

白筱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杉森藍，〈戰後台灣文學翻譯史（1948～1982）——以跨越語言世代作家的翻譯工作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5）。

涂瑞儀，〈吳濁流的漢詩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三、報紙文章

作者不詳，〈小說「ゆがめられた島」吳氏の力作〉，《愛光新聞》34號，1957.07.01，2版。

## 四、電子媒體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特藏影像系統」的「戴國輝版」《無花果》手稿（來源：<https://hslib.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4.06.18）。

中央研究院贈書人紀念網站「梅苑藏書」（來源：<https://lib.ihp.sinica.edu.tw/03-rare/MWSP/09/a.htm>，檢索日期：2024.06.18）。

新竹縣文化局「吳濁流致河原功卷軸」（來源：[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hchcc\\_collec](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hchcc_collec)

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EMZMQMW，檢索日期：2024.08.07）。

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典藏，典藏識別號：NTH-LIB-001-070400060017（來源：[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UST\\_NTHU:886UST\\_NTHU&collectionId=81367160380006774](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UST_NTHU:886UST_NTHU&collectionId=81367160380006774)，檢索日期：2024.08.07）。

